

LI SHI HUI GU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记录历史瞬间·回忆革命历程

历史
回眸



永远的丰碑

主编：殷立群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K250.6
107
:18

永远的丰碑

主编：殷立群

(十八)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丰碑/殷立群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702-358-9

I. 永... II. 殷...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399 号

永远的丰碑

主 编	殷立群
责任编辑	于 泓
出 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23
字 数	213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358-9/K·21
定 价	439.00 元(全十八册)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四、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三反五反运动中，除对贪污分子、不法资本家开展斗争，批评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外，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都十分重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全国报纸杂志除用大量篇幅详细报道贪污分子、不法资本家的罪行，用典型事例揭露资产阶级的真面目及其对国家的危害，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部的侵蚀外，还发表许多文章，从理论上系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以提高广大群众，别是干部的思想觉悟，帮助大家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反运动开始前，许多地方正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进行整党。三反运动开展起来以后，整党已无法按原订计划进行。为此，中共中央要求正在进行整党学习的地方把整党与“三反”结合起来，在运动中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深入考察、了解干部，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





行整党，计划所规定的关于共产党员八项条件的学习，进行党员登记，审查和处理，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的党籍，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各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把“三反”和整党结合起来，不仅查清了贪污蜕化分子的问题，而且使党员和干部通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提高了阶级觉悟。

三反运动开始时，北京、天津的大专院校正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知识分子通过学习，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批判封建的、买办的错误思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抛弃原来的错误立场，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三反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北京市把大专院校的思想改造运动纳入了“三反”，在揭发、处理学校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的同时，强调要大力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校中的领导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成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资产阶级在全国大多数学校中仍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着教育的改革和国家人材的培养，因此，肯定了北京市的经验，要求全国高等院校在进行“三反”时，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责成各高等学校在“三反”中，当师生员工群众通过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的事实，已经发动起来，学校中已形成领导核心之后，立即转入以大部力量有准备地在教师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指示说：要深入发动群众，特别是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保守观点等）。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这个指示还规定：“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高等学校在三反运动中都以小部分力量在职员、工人中进行反贪污斗争，而以主要力量在教师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各地科学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中的运动，文体上与高等学校类似，只是那里没有学生，高级研究人员只是在较小范围的会议上检讨“过关”。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方面，在揭露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罪行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造成了运动的声势和舆论的压力，推动了运动的发展，特





别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批判，对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有很大帮助，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社会影响较大的刊物《学习》杂志在一个时期内连续发表了几篇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片面宣传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面，否认它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有积极的一面，有的文章还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积极性说成是一种欺骗手段，这就完全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些文章所包含的错误观点，是三反五反运动中一部分干部的“左”的情绪的反映。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指出了这种偏差，有关方面作了检讨，并发表了一些观点正确，全面的文章，挽回了社会影响。

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党政机关的日常工作和社会经济生活曾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天津市自三反运动开展以后，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国营企业不收购，不批发，四大贸易公司1、2月份回笼货币的计划没有如期完成。1952年2月15日、16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均应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也要迅速恢复正常。办法一是每个机关抽出1/3或1/4的领导干部专搞业务，二是



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户鼓励他们照常经营外，对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户抓紧时间分几批作出结论，从而使工商户中的绝大多数安定下来。另外，国营经济部门在不影响“打虎”的情况下，恢复业务，银行恢复贷款，各大公司恢复加工订货。由于采取这些有效措施，经济生活受到影响的城市局面有了好转。

三反五反运动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过重要的意义。

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建国初期，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是解决了，而实际上它还严重地存在着。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的几年中，资产阶级内部发展着一种要求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他们不满足于国家政策法令允许的合理利润，而要谋求高额利润，他们不愿意只得到在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范围以内发展，而要求不受限制地发展；他们不甘心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内处于被领导地位，而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平起平坐，甚至居于主要地位。正是这种倾向促使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进攻的主要方法是施放“五毒”。最初，他们还只是个别地干，经过几年的发展，就逐步开始有组织地，而且是大规模地干了。由于不法资本家施放“五毒”，加上旧社会留下来的污





秽，党改机关内部的“三害”日益滋长，有的干部腐化堕落变质。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可能逐步滑向资本主义。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及时地制止了这种资本主义的危险倾向，保证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和方向。

尽管三反五反运动中曾发生过一些偏差，但是，它的成绩是显著的。在政治上，它巩固和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使更多的人懂得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懂得了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应当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经济上，挽回了国家的损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基本上摸清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情况，为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准备了条件。在思想上，划清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气，使之向好的方向转变。

三反五反运动后，在清理了“三害”和“五毒”的基础上，党和政府进一步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有关部门采取了扩大加工订货，增加产品收购，合理调整工缴费，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和扩大对私营企业贷款的范围，调整批发与零售差价，更广泛地组织城乡交流等有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使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1952年下半年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使1952年的工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增长。

中国
社会
性质
问题
论
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30年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政治思想战线的斗争，它从3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在十分严峻的武装斗争环境中，为什么还要开辟另一条战线，并领导这场斗争呢？是什么问题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使许多人都参加进去，并使之持续了数年之久呢？这场论战的结果又怎样呢？我们将从六个方面探讨上述问题。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高举起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与此同时，又在文化思想界发动了反动的文化“围剿”。在这种“围剿”中，一些反动派的御用文人群起鼓噪，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各种曲解，以模糊人们的视线，转移人民的斗争方向，企图达到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目的。在这种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少数有影响的派别充当了反动的急先锋。

第一个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1928年，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办起名为《新生命》的杂志。从这年10月起，陶希圣陆续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的文章。后来又把这些文章编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



国革命》等书，由新生命书局出版。由于陶希圣等人与《新生命》杂志的密切关系，所以被称做“新生命派”。陶希圣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他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商业，有官僚，因此，中国社会早在那时就脱离了封建制度阶段。这样，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那么历代的统治者是代表了什么阶级呢？为了自圆其说，陶希圣便杜撰出一个“士大夫阶级”，认为士大夫是拥有特殊利益的阶级，“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从上述论点出发，陶希圣进而对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荒谬的解释。他说，从秦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崩坏，秦代至清朝，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发达的特殊社会，即“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了。以后他又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陶希圣如此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目的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个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1927年以后，为了与蒋介石争权，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打出了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实





现民主政治的招牌，拉拢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失意军人，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政治派别。1928年5月7日，他们创办了《革命评论》，6月1日，又办了《前进》杂志。1928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因此被称为“改组派”。改组派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他们不但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封建制度，甚至还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大地主。他们说，虽有一些百亩以上的农户，但由于他们家庭人口平均在10人至12人，如果在家中自己分配，每人也不过10余亩。因此中国没有土地可分，不需要搞什么土地革命，更不存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改组派不但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公开打出“防共和剿共”的招牌，可见他们虽与蒋介石在争权上有矛盾，但在反共反革命这点上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

第三个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1929年至1930年，胡适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出路问题。他和原来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在上海开设“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杂志，并提出“中国的现状”和“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等题目进行讨论。胡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反映在他于1930年4月写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中国的现状如何？他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即“五鬼



闹中华”是中国的现状，而“封建势力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因此，“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自己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都是盲动。”怎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呢？胡适开了一个“救世良方”，即“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的不断改革”。胡适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三个派别，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中比较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反动派别。他们都是通过歪曲中国社会性质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在中国社会性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对各种各样的反动观点进行批驳。

20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斗争，这场斗争又通过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影响。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互相对立的意见。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也是如此。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苏联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这种斗争更趋于激化。





在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关于建立苏维埃，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等问题上层开了大讨论。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商业资本主义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商业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他们否认封建压迫还在中国占着主要地位，否认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在国际斗争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只要争取关税自主，就是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使中国革命具有反帝性质。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蒋介石上台，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了中国。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封建势力只是微乎其微的“残余”。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将得到相当的和平和统一，目前尚无革命局势。无产阶级只能等待条件成熟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则认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仍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在广大农村，农民收入的70%归地主豪绅所有。地主阶级不但掌握经济权力，而且还掌握行政和司法权力。封建残余及封建军阀官僚是中国国内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因此，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以反对封建统治。此外，帝国主

